

中国通史之 民国史

九、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

1938年 10月，广州、武汉先后沦陷，它标志着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更加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诱降国民党，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在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的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相继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共及时颁布并实施了十大政策，整风运动在党内开展起来。为战胜由于日寇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重物资匮乏的困难，中共又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1. ‘扫荡’与反‘扫荡’

1938年 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从此，日军对八路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武汉失陷之前，日军在华北投入的兵力是 100万左右，侵占武汉后，迅速改变策略，派部队援助华北，到 1938年 10月，日军布置在华北的兵力达 20多万，占到了全部侵华日军的一半还要多。1939年春，日军在华北实施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借助总体战巩固已占地区，进而继续扩大。自 1938年秋到 1939年秋，日军在华北对根据地进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 1000多次，投入兵力共计 20多万，华北告急。

①发展根据地

1941年5月，日寇发动了对晋察冀边区的大规模进攻，冀中平原首当其冲。5月至6月间，日军集结猿万军队，连续两次从北往南进攻冀中，围剿多个县。

为了抵抗日军的又一次攻势，毛泽东制定了巩固华北的策略。1941年末，由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主力沿正太路迅速救援冀中，同时命一二〇师七一五团从大青山挺进，经过雁门关到冀中支援作战。在一二〇师到达冀中1个月内，共进行战斗150多次，歼敌1500多人。

1941年12月，贺龙部进入行唐地区。此时，驻石家庄的日军第八混成旅水原少将率1500余人寻衅滋事。贺龙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分割包围。在行唐西北的陈庄，战斗持续了12个小时，水原少将大败，日军损失1500多人。

1941年5月，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各部，多次在晋东北各地瓦解了日军的扫荡。不久，敌军阿部规秀部已从张家口抵达涞源，可能向银坊一带进攻。

由于银坊处于晋察冀军分区驻地阜平以北，敌军的动机很明显，这一仗对于晋察冀边区的巩固来讲是非打不可的。在日军中，阿部规秀所部有劲旅的美名，阿部本人有山地战专家的称号，他以中将身份兼任旅团长，任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担任，所以，这一仗打漂亮后，将会给日军的士气造成极大打击，鼓舞边区的军民士气。这是打此仗更深层的意义。

5月12日，阿部规秀率领军队攻打白石口。敌军中了杨部的计，紧追到了银坊。13日，杨部把敌军引到了黄土岭一线，当晚杨部对敌军的包围工作准备完毕。14日，敌主力从黄土岭沿山沟向东挺进，下午，被杨部包围。杨部当即发起猛烈

攻势，敌人乱成一团，匆忙抢占几个山头准备突围，杨部分兵，一个个包围歼灭敌人，双方开始激烈地争夺山头。这时恰好阿部规秀在一个小庙前指挥各部突围，当场被杨部炮兵营一炮击毙。

在华北抗日战争中，这次战斗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敌军在华北方面的总司令金田骏为阿部规秀开追悼会，并写了挽联：“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本《朝日新闻》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为题对阿部规秀之死作了连续报道。

在瓦解日军的冬季扫荡中，晋察冀边区作战共计 1500 次，歼敌 10000 多人。同时，冀东、平地区西也多次瓦解敌人的扫荡。到 1945 年上半年，晋察冀边区已设立了县政权 150 个，是 1943 年边区政府刚成立时的两倍还多。

1944 年 10 月间，敌集结 10 万人的兵力，分九路进攻晋东南地区，朱德、彭德怀亲自率领一二九师，从 10 月初到 12 月初的两月间，持续作战，使敌人伤亡近万人。

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一部分自 1944 年 10 月进入鲁西地区以来，不断壮大了山东战场的抗战力量。1945 年 1 月，敌人调集 10000 多人分九路扫荡肥城、泰安地区。1 月 10 日，敌军各路联合进攻，把一一五师一部连同师部、鲁西地委机关干部及鲁西区委围困在肥城以南不足 10 里的山区中。11 日，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先后击退敌人进攻 10 次。

自 1944 年到 1945 年，山东军民连续粉碎千人以上的扫荡有 100 次，八路军及地方武装增至 10 万人，县级民主政权已达 150 个。

1945 年 1 月，叶挺在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担任指挥，罗炳辉、徐海东任副指挥，后又成立了第五支队，

这样,兵力增加一倍,由 缘园园人发展到 员万人,并瓦解了敌军的多次扫荡,对皖东根据地的巩固与加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员缘年,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被改编为第六支队,人数增加到 员缘万人。随后,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向豫皖苏地区挺进,与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五纵队,彭、黄分别任司令。

员缘年底,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建了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员缘年夏,江南指挥部主力渡长江北上,成立了苏北根据地。

②百团大战

员缘年 苑月,日本第二次组成近卫内阁,确立了侵华政策: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进西安。同时,对华北采取巩固方针,对各根据地和八路军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为应付上面的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地区发动一次破袭战,采用“截线拔点”的方法,投入较多兵力,破坏正太路等敌人的主要交通线路,中断其联络,断绝其接济,瓦解其增援。接着再用奇袭、围困、强攻等方式灭敌,夺回其在根据地内部的占领地点,推动华北战局的进展;进而破坏其进攻昆明、重庆、西安的战略部署,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力克投降倾向,变整个战局为主动局面。

八路军在这场战役中投入了兵力 员缘个团,史称“百团大战”。苑月 圆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下达备战的命令。愿月 怨日,又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明确了各部作战目标。

百团大战的主要破袭目标是正定到太原的正太路,作战的目的是破坏该路的多段铁路,歼灭掉部分敌人,收回许多重要的关隘据点,并趁机扩大战果,扫除该线南北地区的许多敌

人据点,在该路两侧开展工作,以使该线交通瘫痪。全长 100 公里的正太铁路横卧在太行山上,沿路有井陉、阳泉等重要煤矿,是日寇运兵和输送战略物资的主要通道。日寇第四、八、九混成旅团,分别在正太路沿线 100 个据点驻守,还配备有许多装甲车。日寇将之吹嘘为“钢铁封锁线”。

百团大战分三个阶段展开。

第一个阶段,从 8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此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破坏铁路、公路交通。

8 月 1 日夜,八路军各部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了华北各地千里交通线,立时使交通阻断,通讯中断,华北敌军恐慌至极,乱作一团。

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各部 100 个团的兵力,将 150 个团的兵力分成 30 个纵队破袭正太路平宝至石家庄一段,重点为娘子关、平定段。另外还用 100 个团的兵力进军北宁路、德州以北的津浦路。

激战 10 天后,一二九师仅在正太沿线就歼灭敌军第四混成旅团近 30 个大队,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各部进攻正太路的任务。

8 月 15 日,第一阶段战斗结束,各部撤出战场,休整 10 天。从 8 月 16 日起到 9 月初,第二阶段战斗开始。第二阶段战斗的任务是歼敌与破袭同步,不断推动战争。

晋察冀军区第二阶段的任务是毁坏灵丘、涞源境内的公路,组织“涞灵战役”,进攻这两座县城。冀中军区进攻任邱、大城、河间、肃宁地区。

9 月 1 日,八路军又组织兵力对灵丘、涞源、广灵地区进行出击,敌人发觉这一动向后,迅速调来驻守南陂头的兵力,妄图合力攻击八路军,八路军就势紧急袭击南陂头的敌占据

点，一次全歼 苑多个驻守的敌人。

第三阶段从 苑月 远日到 苑月 缘日，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反扫荡。

敌人从晋东南出发开始扫荡。苑月 远日，敌第四混成旅团和第三十六师团 苑多人，分别从辽县和潞城出发，协同作战，南北夹击武乡、榆社、涉城、潞城、辽县等地，然后又出动强大军队对浊漳河两岸根据地进行扫荡。敌人来时，八路军掩护群众上山，敌人走时，八路军又立刻返回村子抢修被敌人破坏的物品。苑月中旬，苑多敌人进犯太岳的沁源地区，八路军避开敌主力，出其不意，先后在官塘一带歼敌 苑多人。晋察冀军区在第三阶段中共作战 苑余次，歼敌 苑人。

苑年 苑月 缘日，八路军粉碎了敌军的扫荡，其军队撤出根据地，百团大战进行了三个半月，到这时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各部在华北各地 苑里战线上进行了 苑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 苑人，俘获敌军 苑人，日军投降 苑人，俘伪军 苑人，伪军反正 苑人，夺回了许多日军占领地，一连收回 苑座县城，并破坏了敌人的交通，正太铁路 苑个多月未能修好运行。

百团大战几十万大军齐心协力，一致对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抗战以来最鼓舞人心的一次主动出击。百团大战既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又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它是华北的黎明，是民族复兴的曙光。

③“反扫荡”斗争

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是在 苑年至 苑年。

苑年的百团大战使日寇大为震惊。苑年 苑月，日本

陆军大本营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 竭尽全力,发挥联合作战优势,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本派遣军视华北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圆月,冈村宁次出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接着,华北地区上演了一幕幕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惨剧。如 员月下旬,员圆园余日军在‘扫荡’冀东丰润县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的男女老幼集合到一个大院内,用机枪扫射,杀害群众员圆园多人,焚烧千余间房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日军为了把中国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大后方,在中国占领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并集中日、伪军接连‘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员圆年至员圆年,在‘扫荡’华北的根据地时,日军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员圆次,万人以上至苑万人的达圆次。在同一个地区有时反复‘扫荡’长达三四个月,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更可恨的是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在日军史无前例的残酷进攻中,在后方作战的军民死伤惨重,部队兵力骤减。日军还破坏了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根据地面积减少,总人口由员亿人减到了缘千万人以下。敌后的耕地被毁,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加上日军的抢掠,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日军的目的是想搞垮敌后根据地的经济,进而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还击了日军在晋南中条山、浙赣和湖南长沙等地的进攻,并把中国远征军派往缅甸,支援缅甸的反法西斯战争。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利用英美力量来抵抗日本,所以接二连三地制造反共摩擦。国民党政府既继续停发八路军的弹药、薪饷、被服等物资,又调集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阻

断其与外界的联系。

为应付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动人民参与作战，全面反击敌人，即在政治、军事、思想、经济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削弱和消耗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实现目标的首要工作是实行统一领导，配合好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的文件规定 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

从1943年春到 1945年末，新四军还推行了精兵简政政策，武装斗争配合非武装斗争的办法被运用于主力兵团突击、转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游击化、军事化，不论何时，袭击干扰集中的敌人，围歼分散的敌人，不让下乡的伪军安全回到原地。日、伪军集中在某地区“清乡”时，各邻区联合作战，使日伪军顾头顾不上尾。正是这些灵活多变的方针政策打破了日伪“清乡”的美梦。

在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开创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歼敌方法，如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这艰难的岁月中，中共中央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巩固抗日根据地。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了“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的政策。

为了解决物资的严重缺乏问题，使抗战继续进行，同时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对巩固和

发展敌后根据地起了决定作用。中共中央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从被敌人分割的、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出发，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创造了政府机关、军队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的经济模式。军队的生产自给，形式上违背分工的原则，似乎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却是进步的，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善了生活，使军队战胜了生活资料匮乏的困难，同时减轻人民赋税，有能力长期支持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率先推行这项政策。1942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在朱德亲自视察后，从猿月起，王震率第三五九旅陆续开进了南泥湾。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袖，也亲自参加了生产劳动。

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极大地改善了军民生活。1942年到1943年的猿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 1000 多万亩荒地。从1943年起，敌后根据地的机关在半年内甚至两三个月一般可以实现蔬菜和粮食的自给自足，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也大约只占收入的 10%，按当时的生活标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又积累了许多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

四 焦土抗战

国民党政府在其军队无法抗击日军攻势的情况下，便实

行了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做法和政策。继花园口黄河决堤以后,国民党又打出了所谓焦土抗战的招牌。

1938年10月10日至15日,日军先后占领广州、武汉。然后,攻占武汉的日军沿粤汉路继续向南进犯,直逼岳阳,并于10月15日深夜攻占了岳阳。长沙突然之间成为夹在粤汉线上的一座孤岛,形势危急。蒋介石对于保卫长沙的问题,在10月10日和10月15日两次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商讨战局,参加会议的有冯玉祥、何应钦、陈诚、唐生智、杨森、熊斌、何成浚、张治中等,列席会议的还有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等。当日军攻占岳阳的时候,蒋介石认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将是长沙,便于10月15日上午10时密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命令他“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实行“焦土抗战”,以此阻止日军的进攻。张治中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密议,决定任命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放火总指挥,放火焚毁长沙。徐昆接到任务后,立即进行了部署。如闻警报声响,或者发现有一处起火,就可以开始放火。

10月16日凌晨11时后,长沙南门外一伤兵医院失火,正在待命的纵火队员误以为是纵火信号,各个放火队立即开始行动。12时10分,整个长沙顿时陷入一片熊熊大火之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烧毁了一批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建筑,烧死居民1万余人,烧毁房屋1万余栋,损失了不计其数的财产。而这时候,日军并未攻打长沙。这即是著名的长沙大火案。国民党自焚家园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纵火带来的严重后果下,蒋介石迫于群众的舆论压力,于10月17日亲自从南岳到长沙视察,为逃脱罪责,他于10月17日下令将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交由军法会审判。10月18日,湖南省

政府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发放救济费 500 万元，长沙市市长席楚霖防范火灾不力，应撤销其官职。当天，鄧悌、文重孚、徐昆分别以渎职殃民及放弃职守罪被判死刑，在长沙被枪决。而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乃是蒋介石。

长沙大火，残酷而有力地证明了焦土抗战是不成功的，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却仍竭力吹嘘这个政策。他们称，抗战期间牺牲是必要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说，至于人与地俱成灰烬，既发扬了牺牲之精神，同时也重创了敌人。这次长沙大火，只是某些人对焦土抗战内涵的滥用及误解罢了，以后小心谨慎就行了。可见，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在找借口逃避责任。

《八路军军政杂志》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从 1937 年 1 月 1 日创刊，至 1938 年 1 月停刊，历时 1 年零 1 个月，总共发行了 1 卷 1 期。

《八路军军政杂志》的编辑工作，由编委会直接领导。编委会成员有五个人，除毛泽东亲自担任编委外，其他四人是肖劲光、王稼祥、郭化若和肖向荣。肖向荣兼任主编。

关于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的意义和目的，毛泽东在为《八中军政杂志》写的发刊词中已指明：‘当抗日战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时，八路军同仁出版这个《军政杂志》的意义十分明显，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人民和抗战友军，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他指明了创办此刊的重要目标是：坚持党的坚决抗战政策，为抗战服

务,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八路军军政杂志》保存了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军事论著,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策略作了全面地阐释和宣传,解释和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辩证法,详细系统地介绍、研究、总结了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政策工作、战斗经验等,并且报告、报道和认真钻研了古今中外著名的战争、战役、战斗和著名的军事思想论述等。

《八路军军政杂志》并不只是研究、总结军事经验,它还有一定的新闻报道任务。它生动再现前线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勇于奋斗、不畏艰苦、英勇苦战和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全面地报道各种工作的具体情况,无情地揭露了当时敌寇和汉奸的残暴的兽行。

《八路军军政杂志》坚持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努力做到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思想性影响读者,始终坚持不懈地为全民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斗争着。

瀛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1948年 11月 10日至 14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出席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有 158人,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该会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变之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全面而又系统地分析讨论了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中的经济、政治、对日外交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蒋介石在会议上作了《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报

告,他宣布抗战第一阶段是广州、武汉失陷之前,而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是抗战第二个阶段。

蒋介石所说的抗战,其实际用意就是要回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样子,即可以不要东北,华北也可以维持形式上的统治,只要能保全与四大家庭及英美利益关系甚密的华南与华中,便可弃中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与日本停战讲和。这一演讲完全暴露了蒋介石在新形势下对日本的投降嘴脸。

其次,蒋介石在会上还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他在《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在最近半年中一定要扩充有组织、有训练的党员,最少要在现有党员总数的基础上再扩充 四倍。根据蒋介石的上述讲话精神,会议通过了《改进党的工作方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议案,决定把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报告作为今后党务工作方针,强调要适应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开展国民党的工作,加强发展组织和统治思想,特别是对基层和青年的控制,努力做到不断培养新生力量,努力把范围扩至乡村社会力量之中,力求革命理论之指导等。

再次,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要求加强保甲编制,每一保甲长均兼任政治警察,并能带领所辖地区人民一致防止异党之活动。在异党活动较频繁的地方,应该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受其利用。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应一律依法制裁。规定各地党部密饬全体党员,注意提高其警觉性,并饬令经常调查异党之组织活动情况报告党部,以便随时应对。会后又接连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

处置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这些条例和办法详细地规定了对待共产党的办法、原则、策略，其政治制度的法西斯化和反共之心，一目了然，“路人皆知”。

最后，会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机关，其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

1938年 苑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议长由蒋介石担任，李宗仁等 5人为会员。会员包括有军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参谋总长、军事参议院院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以及行政院的军政、财政、海政、铁道、交通五个部长。

1938年 圆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国防委员会代替国防会议，扩大了国防委员会的权力，它有权直接指导南京政府的各级行政机关、军事部门，并有督察各机关的权力。

1938年 七七事变后，愿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设置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的国防最高会议来代替国防委员会。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为副主席，主要的权力就是决定国防经费、国防方针、国家总动员以及相关事项。同年 5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停止政治委员会会议，由国防最高会议代替执行其权力。

1938年 员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将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国防最高委员会除代替执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权力以外，还负责管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各部门、国民政府五院和军委所属的各部门。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最高

决策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权上的法西斯化的进一步深入，更加巩固和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已由抗日战争开始时的相对较积极地联共抗日，转向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是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内政策的重大转折点。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发表

1941年 苑月，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张闻天的要求下，刘少奇为该院学员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简称《论修养》）的报告，深受全体学员的好评，随后经毛泽东审批阅读整理成文。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建议尽快发表。愿月至 怨月间，《论修养》在中共中央主办的《解放》杂志上发表。没过多久，又印成单行本供干部学习。

《论修养》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阐明了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

刘少奇指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异常艰苦的事业，要想圆满完成这一事业，共产党员必须在斗争的同时“改造自己”。

第二，阐明了共产党员自身修养的内容和标准。

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章中规定的入党条件，是每个共产党员提高自身修养的基本标准，也是最起码的要求。

刘少奇在《论修养》中，论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及其

内容。他说：“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

第三，阐明了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要求和根本目的。

从个人来讲，“就是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为此，刘少奇对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以下要求：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树立自身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己对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其次，必须“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错误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为标准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最后，必须“经常采用适当的方式，正确的态度，去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潮进行斗争”。

第四，对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方法和途径作了论述。

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主要有两个途径进行修养和锻炼，一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二是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对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能正确地处理它，就有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迷失方向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和俘虏。”

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加强党性修养的前提是，首先是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样的学习、反省和自我检讨中，去肃清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残余以至某些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利益的最微弱的萌芽”。共产党员进行